

知人不易,重在“制度忠诚”

◆ 韩昇

唐太宗得人之盛,在中国古代,没有一个时期可以与之相比。文臣有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魏征、王珪、虞世南等,武将有李靖、李勣、尉迟敬德、薛万彻、薛仁贵等,这一大批人不但在唐朝声名赫赫,就是放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之中,也是顶级人物。“房、杜”是宰相的楷模;魏征成为谏诤的代表;李靖在人间是战神,到天堂则是天王;老百姓逢年过节在门户上张贴门神,少不了秦琼和程咬金,他们全都是这个时代的人物,群星璀璨。

唐太宗以知人善任著称,这一大批人是他从五湖四海网罗而来的,不少人甚至来自敌对阵营。在这些人身,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?我们能不能从中看出唐太宗是如何鉴别人才的呢?

一、看人重信义

唐太宗说过,每个时代都有人才。人才从来不缺,关键是你要用什么样的人。唐太宗要用什么样的人呢?在众多人才中,被他选中的人有没有共同之处呢?

1、李勣重道义

李勣是有代表性的例子。李勣本名徐世勣,曹州人,也就是今日山东省菏泽市人,家境富裕。隋末农民起义,李勣参加了瓦岗军,因为足智多谋而且作战英勇,很快脱颖而出,成为瓦岗军最主要的将领。瓦岗军同隋军主力决战,两败俱伤,统帅李密不得已投靠唐军,李勣也因此归顺唐朝。

李勣归降对于唐朝的价值太大了,因为他控制着东部的大片土地,他的地盘有多大呢?西起河南平顶山,东至大海,北面到河北邯郸,南面到长江,好大一片,足抵古代好几个国家。这是给唐朝最好的见面礼,足以让李勣取得高官厚禄。但是,李勣没这么做,他对部下说,这片土地是李密派我驻守的,所以不能由我献给唐朝,而应该交给李密,让他取得这功劳。李勣把辖地的地图、户籍和兵员名册编制成册,派使者前往唐朝交给李密。唐高祖李渊听说李勣投降的使者来了,却没有见到降表,只有给李密的密函,觉得非常奇怪,派人打探,才知道是这么回事,大为赞赏,把功德全都让给统帅,真是一个纯粹的人。唐朝给了李勣最高的礼遇,授予他皇帝的姓氏,故史书上都称他为“李勣”。

不久,心高气傲的李密不甘愿屈居人下,叛唐出走,被唐朝杀死。唐朝很快把这件事通知了李勣,这对李勣是一个考验,检验他的品格和内心真实的想法。李勣会怎么做呢?他马上向朝廷请求让他来礼葬李密,毕竟是自己多年的领袖,李勣不能看着李密暴尸野外,这是他对于李密个人的恩义。但是,他不赞同李密政治上的反复,在人心思定,国家走向统一的时候,既然选择归顺了唐朝,就应该忠于唐朝,不能因为个人的利益而违背历史潮流,这是他的政治道义。唐朝领导人再次看清了李勣的人品和政治立场,很有气度地允许李勣以礼收葬李密。

或许有人会猜疑李勣是不是在表演,甚至是伪善。李勣用行动一再证明了自己,既坚持政治原则,又顾全个人情义,公私分明,既不因公废私,更不因私背公。这里再说两个故事。

第一个故事,李勣自从归顺唐朝之日起,他已经看到唐朝才是真正能够结束动乱、统一中国的力量,从此对唐朝忠贞不二。他受唐朝委任守卫山东,直接面对当时最有战斗力的窦建德起义军,尽了全力,还是抵挡不住,兵败被擒,被逼投降。李勣是难得的将才,窦建德非常想用他,可又担心他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,便将他父亲扣为人质。李勣家不能两全,他毅然选择了国家,找到机会逃回长安。唐朝也很有气度,理解他忍辱报国的苦心,像以前那样信任他,从此他在唐太宗的麾下南征北战,平窦建德,降王世充,破刘黑闥,擒徐圆朗,斩辅公祐,荡平河北江南,长驱深入漠北,攻灭突厥,战功仅次于唐太宗。唐太宗对他信任有加,让他镇守并州(今太原)长达十六年,非常罕见。唐太宗说:“隋炀帝不懂得选用良将戍守边疆,只晓



唐太宗像

得修筑长城,见识之低,到了这等地步。我用李勣一人,威震突厥,北疆安宁,岂不胜于修筑长城?”战争最伟大的力量在于人,天下从来不乏人才,缺的是知人善任。

第二个故事,讲的是李勣与单雄信,他俩是瓦岗军中左右并称的骁将,生死交情。洛阳之战,单雄信差点枪挑唐太宗,被李勣喝住。后来,单雄信兵败被俘,李勣尽力为他求情,希望能够争取他归降唐朝,没有成功。单雄信将被处斩的时候,李勣亲自来到刑场和当年的战友痛哭诀别,哭到悲切处,李勣拔刀割下自己腿上的肉喂单雄信咽下,说道咱们从此诀别,让我身上的肉陪你同归黄土吧。全场为之震动。单雄信死后,李勣收养了他的儿子,尽兄弟情义。

李勣所作所为是有很大政治风险的,如果唐朝没有胸怀和气度,他这样的降将势必遭到猜疑,一旦没有利用价值就会被清洗。从这两件事情可以看出,唐太宗考察人并不是从狭隘的私人忠诚出发,不搞以人划线。那么,唐太宗看重的是什么呢?他对李勣的器重最根本的还不是他的才干,这要到唐太宗晚年才说了出来。

唐太宗晚年发生更换太子的政治变故,唐高宗性格温和,唐太宗十分担心,亲自选定一批忠诚可靠的老臣来辅佐太子,其中就有李勣。唐太宗对李勣说道:“朕将托孤于你。当年你不曾辜负李密,现在你也一定不会辜负朕。”由此可知,唐太宗看人,非常重视信义,也就是从根本之处考察一个人。一个有品格,重信义的人,才靠得住。

李勣算不算个案,有没有代表性呢?我们再看唐太宗亲自处理的其他事例。

2、禁军三将讲忠诚

我们知道,一个人内心最真实的一面,平常很少表露,往往要到危机关头才显山露水。所以,大是大非的关头是考察人的难得机会。唐太宗平定天下,功劳太大,对长兄李建成的太子地位提出挑战,最后演变成历史上著名的“玄武门之变”,唐太宗发动兵变杀死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,登上皇位。可是,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属不服气,抵抗失败后,有些人带着武器跑进山中,准备继续抵抗。唐太宗怎么处理呢?

先说玄武门兵变当天的事情,李建成的部属冯立、薛万彻和谢叔方三位将军听说李建成遇害,奋起反击,率领东宫和齐王府的二千精兵赶来攻打玄武门,战事激烈。薛万彻是被唐太宗称作三大名将的将军,他看玄武门一时攻不下,便想出一计,准备分兵攻打唐太宗的根据地秦王府。形势变得非常危急,幸好是唐太宗的部下向对方将士展示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首级,士兵们见大势已去,才溃散而去。冯立、薛万彻和谢叔方三人都逃入山野,观望形势,准备抵抗到底。然而,这场宫廷政变并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引起内外的反击,唐太宗迅速控制了局面,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势力彻底失败了。冯立是为了捍卫李建成所代表的政治秩序而战,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负隅顽抗,所以看到形势比人强,他不能继续呆在山中变成盗匪,

便出山自首。唐太宗斥责他:“你带领部下杀了我那么多人,难逃死罪。”冯立回答道:“我是李建成的部下,就应该为他死战。而且打仗的时候,哪里会想到杀多少人呢?”冯立说的都是实话,如果不是鼓励卖主求荣吗?唐太宗当下赦免了冯立,而且还让他担任左屯卫中郎将,也就是禁军的将领,等于是把自己的安全交给他来保卫,这种气度和对人的信任,恐怕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。唐太宗相信讲信义的人靠得住。冯立被彻底感动了,他说:“我受到莫大的恩幸获得赦免,必定以死相报!”后来,突厥大举入侵,一直深入到京畿,冯立率领数百骑兵和突厥在咸阳城下死战,杀敌甚众,挡住了突厥的攻势,让在一线指挥作战的唐太宗非常赞叹。

在“玄武门之变”时和冯立并肩抵抗唐太宗的谢叔方,和冯立一样第二天出来自首,他在作战中杀了唐太宗部下两员将领,直到唐太宗部队向他展示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首级,他才停止战斗,下马痛哭,向李建成和李元吉拜别,解散部队,自己逃入山中。他的抵抗是忠于职责,停止抵抗是为公而不为私。这一幕幕为唐太宗亲眼所见,所以,谢叔方来自首领死,唐太宗同样赦免了他,说他们的行为是“此皆忠于所事,义士也。”谢叔方也留在禁军,继续担任将领。

第三位拼死抵抗的将军薛万彻,归顺唐太宗之后也受到重用,屡建成功,后来还被招为驸马。在唐太宗看来,忠于职守是必须加以鼓励的优良品质,而不应以私人恩怨进行政治划线,否则就等于提倡见风使舵的政治投机。唐太宗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属没有进行政治清洗,他甚至发布命令,在“玄武门之变”以前和李建成、李元吉有瓜葛的人与事,都不得检举揭发,否则反坐。“玄武门之变”事关唐太宗的身家性命,即便如此,唐太宗在忠于职守和见风使舵两者之间,毅然选择了前者,这就是他做人的根本原则。

二、不要私人忠诚

唐太宗用人特别看重信义和忠于职守,在当时无疑是吹进一股清新的风气。自从西晋灭亡以后,长期的动乱,完全改变了任人唯贤的原则。北齐的实际缔造者高欢有一段对臣下说的话非常形象,而且具有代表性。当时,高欢的部将贪污腐败、横行霸道,有正直的大臣一再劝谏高欢要约束部将,清除腐败。于是,高欢对他说,现在的形势是西边有北周和我对立,南边有梁武帝以正统自居,很有号召力,所以,我如果管束部下,不许他们腐败,武将就会投奔北周,文官则会投奔梁武帝,我就完蛋了。这段话告诉我们,当时普遍存在的用人原则是以私人忠诚为基础的以人划线,或者说政治帮派,而维系政治帮派的纽带是封官许愿等利益关系,甚至以腐败为代价来换取部属的忠诚。其结果一定是有利则合,无利则散,利合则国亡,利失则恶斗。西晋以来长期动乱的历史,就是一幅利益诱惑下丑恶卑鄙的地狱图。

这就是当时的现状,而唐太宗要改变的就是这种用人的现实。因为在这种用人风气下,政治败坏,道德沦丧。实际上,利益是换不来真正的忠诚的,甚至正好相反。因为忠诚于利益,必然见利忘义;忠诚于理想,则为道义而献身;忠诚于制度,则为国家尽心尽责。所以,用什么原则去凝聚人,必然得出不同的结果,这是用人者自己的选择,怨不得别人。有鉴于此,一定要把私人间的忠诚转变为对于制度、职责的忠诚,这样的政治关系才是健康和可靠的。

唐太宗一再告诫部下,语重心长地说道:“隋日内外庶官,政以依违,而致祸乱,人多不能深思此理。当时皆谓祸不及身,而从背言,不以为患。后至大乱一起,家国俱丧,虽有脱身之人,纵不遭刑戮,皆辛苦免,甚为时论所贬黜。卿等特须灭私徇公,坚守直道,庶事相启沃,勿上下雷同也。”(《贞观政要·政体》)

以国家为重,忠于职责,政治风气就会从私人利益转向人怀公心,唐太宗先带头做起。他提拔一位非常优秀的官员杜正伦,当面对他说:“我任用贤能,并不看他如何能给我办事,而看他能不能做有利于百姓的事情。我对于皇亲国戚和功勋旧部中的无能之人,都不予任用。今天提拔你,是因为你的忠诚与正直,希望你能以此自勉,不辜负我的期望。”唐太宗并没有向杜正伦讨要提拔的私恩,而是勉励他要做官为公。很清楚,唐太宗要建立的不是私人恩义,而是忠诚于制度。

三、依法执政,才有人气

在这种政治风气下,坚持公心和原则的官员会得到鼓励。有一位县令把官府的人夫用来干私活,这当然是贪污行为。唐太宗痛恨贪污,见到这件案子,批示处斩县令。这时候,监察部门的一位中级官员李干佑站出来反对,当面对唐太宗说:“法律为陛下和天下人所共有,而不是陛下个人专有的东西。现在陛下不按照法律,县令犯的是轻罪,却处以重刑,我担心今后人人自危,手足无措。”唐太宗并不认为受到顶撞,他不但接受批评,而且还把这位监察官员提升了一大级,因为他尽职尽责,堪当重任。

唐朝的制度是用法令来规定的,遵守制度就是遵守法令,就是依法治国。法律对于所有的人应该都一样,而不能在法律之外另外开特殊通道,搞双轨制,甚至三轨制、四轨制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体现的是平等的精神。但是,作为现实中生活的人,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自身阅历和经验的影响而出现偏差,特别是权位越高的人,这种偏差影响就越大,甚至造成全局性的偏差。

我们知道隋朝和唐朝源自北周,从地域上说,都来自关陇地区。有些学者夸大了这个地域特色,把它上升到政治层面和组织路线上,制造了北周和隋唐三代存在着一个所谓“关陇集团”的说法。这种说法当然是不成立的。但是,关中地区和山东地区的人,存在着地域之间的相互歧见,这是客观的事实。秦始皇以关中征服中国,潼关以东,后来是太行山以东这片古代称为山东地区的人,已经形成对西部人的看法,并且长期延续下来。这只能说是地域间的歧见而已,并且广泛存在于中国的许多地区。唐太宗出自关中,自然不能脱俗。当皇帝之后,不时依然站在关中的立场上,评论山东人。监察官员张行成听到之后,觉得皇帝这样说很不好,于是当面向唐太宗进言道:“天子以四海为家,不当以东西为限;若如是,则示人以隘”(《旧唐书·张行成传》)。张行成作为朝廷的监察官,他忠于自己的职责,不管是什么人,不管他官有多大,哪怕是皇帝,遇到错误的言行,即使得罪人也必须提出纠正。唐太宗不但接受了张行成的批评,而且还赏赐他,以表彰他尽职尽责。以后,朝堂每次讨论重大事务,唐太宗都要求让张行成参加,让敢于直言和忠于职守的官员对朝廷的重大决策随时进行监督。

法律为天下人所共有,而绝不是一己之私,法律的外在形式就是制度,依法治国就必须严格遵守制度,因此,树立制度忠诚精神,并以此规范官吏,使他们成为法律和制度的践行者与捍卫者,国家才有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。制度忠诚是选任及管理官吏的根本精神,是弘扬正气之本。

公正用人,公平赏罚,培育了忠诚于国家的正气。上下同心,才能够锻造出大唐盛世。为什么唐太宗会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呢?大诗人白居易在《七德舞》诗中写道:太宗十八举义兵,白旄黄钺定两京。擒充戮窦四海清,二十有四功业成。二十有九即帝位,三十有五致太平。功成理定何神速,速在推心置人腹。